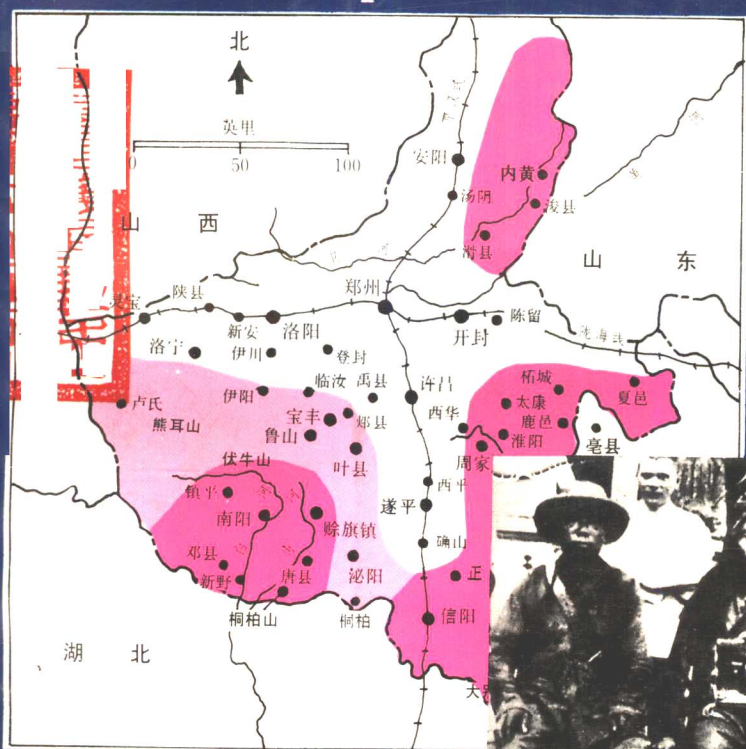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的土匪

by *Phil Billingsley*

【英】贝思飞著

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



徐有威 李俊杰等○译
卜文 潘慕平○校

民国时期的土匪

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

by

Phil Billingsley

【英】贝思飞著

徐有威 李俊杰 钱铿 周乐诗等 译

卜文 潘慕平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 by
Phil Billingsle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责任编辑 顾兆敏
封面装帧 王建纲

民国时期的土匪

[英]贝思飞著

徐有成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兵书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75 插页4 字数 314,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内精装 200 本)

ISBN 7-208-1349-7/K·324

定价(精) 13.10元 (平) 9.00元



图1, 20年代日本的一张宣传漫画, 描绘了一个肥胖的中国人, 由于腹部的肿大而无法行走。腹部的“匪”字与“肥”同音。这幅漫画反映了日本人的看法, 内地省份长期的土匪出没是庞大的中华帝国的必然结果, 它暗示了日本并吞中国的企图。选自《支那名物匪贼物语》(东京, 1931年)。



图2，一方官方的军印说明一个匪酋被正规军招募，这是颁发给福建护国军支队的官印。选自安得思《在中国的野营和足迹》（纽约和伦敦，1918年）。



图3，两位满州匪酋。其中一位后来成为张作霖的上校。选自麦凯《落入中国匪窝》。



图4,“白狼过秦川”,一位当地艺术家所创作的表示同情的当代木刻,描述了1914年4月白朗进攻陕西凤县的情景。上面部分在“白元帅”旗下的是白朗本人,他正在指挥骑兵攻城。下面部分是等待攻城信号的步兵。选自王树村《关于白朗过秦川的一幅版画》,《文物》1964年10月。



图5,一位满州匪酋,这是他被捕之后拍摄的照片。(1922年11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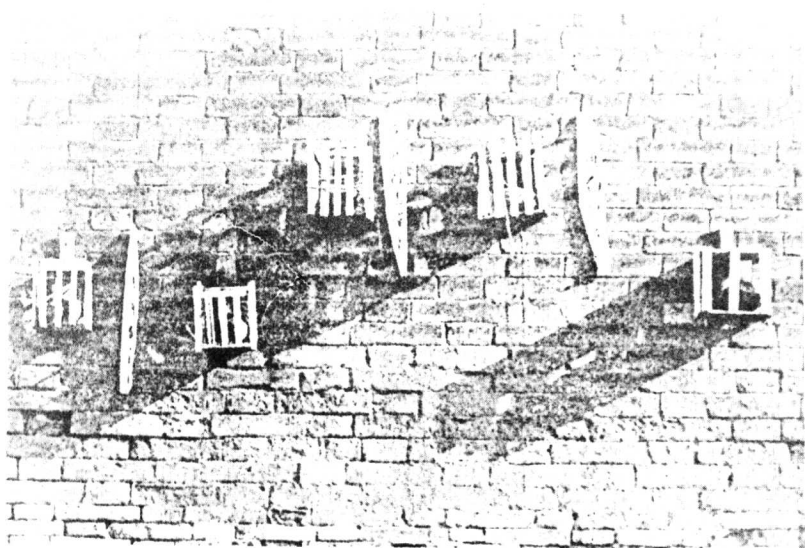


图6, 白朗和他的几位追随者的头颅被装在木枕里悬挂在开封南门的城墙上。根据告示, 右起第二个木枕装着白朗的头颅。选自威廉·怀特《华裔犹太人》(纽约, 1966年)

图7, 由云南土匪颁发的一面令旗, 持令旗者说明已经得到许可通过土匪控制的地区。选自洛克《一位孤身地理学家的经历》。



中译本前言

徐有威等先生将我的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译成中文，对此我深感荣幸。然而同时，我也深感惶恐，我对中国现代史中的土匪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还有待广大中国读者的审读惠正，因为这本书毕竟是在英国和日本的图书馆中撰写的。

我的这项研究工作始于1969年，那时我正在英国里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已故的拉铁摩尔教授。正是这位拉铁摩尔教授，他不仅帮助我意识到中国土匪的无所不在，特别是沿着“亚洲腹地的边缘地区”，而且他帮助我认识到土匪的生活方式，这与权威道学家的批评相比，显然远为意味深长。

60年代末，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治史态度，许多年轻的学者开始反对传统的史学家仅仅留意大人物的做法，他们提出历史学家主要应该关心普通民众，因为正是他们构成了人口的绝大部分。我对中国土匪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寻求新的民众史的时代精神中开始的。

60年代还有一场运动风起云涌，那就是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我相信，寻求新史学和反战运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年轻人为越南人民的行动所激励，他们怀疑现状，开始寻找审视世界的新方法。而寻求新史学就是越南战争所激起的政治运动在学术研究中的反映。

换言之，那是非常浪漫的时代（人们自我感觉有能力扭转乾

坤)，随后又出现了一股极浪漫的思潮，不仅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而且在那一时期进而研究所有的起义和造反。我承认，我对土匪的研究也不例外。

1974年我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就来到日本工作。1979年以前我一直没有专心研究土匪，那一年有人提议我可以准备出版研究成果。至此，距我起步研究已有整整十年，当然我的见解已相当不同了。

作为对60年代浪漫思潮的反应，到了70年代，人们变得相当的注意实际和自我反省。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男人们也被迫重新审视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男人都承认，在60年代，我们只关心重大事件，对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加留意。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此刻开始从研究“英雄造反”的丰功伟绩，转向审视以往对革命运动和造反起义的思考方法。在妇女运动的影响下，对“男性”思考方式的批评蜂起。这种“男性”思考方式对群众运动过度热衷，而对个人行为则颇为冷漠。当时，对尚未启迪民智就推翻了国家政权的革命进行批评的风气颇为盛行。因为这些革命者常常建立起象他们前辈一样的保守政权，或者比他们的前辈还糟糕。西方的这一反思时期，正好是我打算修改此书付梓之机，于是，我开始更关注那些作为个体的土匪，特别是作为个体的男人。

妇女运动的另一后果是，男人们开始比以前更加关心日常琐事。虽说“放弃浪漫空想”并没有强烈地影响所有的男人，但我本人却深受影响，因为我同情妇女运动。到70年代末，我已是两个幼儿的爸爸。作为“获得新生的”男人，我决心不仿效过去那些一心扑在自己研究中的男性学者，将自己锁在书斋中，把家务和育儿之事全推给太太。因此，我在撰写《民国时期的土匪》时，往往一只脚在书斋中，一只脚在厨房里；打字时每只膝头盘踞着一位小宝宝；每隔数小时就要停下来烧饭、换尿布，等等。结果，我用了十年功夫才写完这本书；如果我象大多数学者那样埋头苦干，那么这本书只

要五年就能写成。另一方面，我想这本书也反映了我作为一个男人自我意识的增强，这是看管孩子、操持家务所带来的。但我相信，这本书的内容本身要比它的主题更为有趣。关于这点，我想我的中国读者自有明鉴。

除了象白朗那样发展成重大起义的匪帮之外，中国的学术界对土匪几乎很少关注。1949年以前，土匪通常被当作邪恶的东西而遭冷落，除了耸人听闻的言词之外，几乎少有记载。1949年以来，土匪不再成为时事问题，道德评判也为政治评判所代替。因为土匪是“原始的革命者”，他们被认为没有在“现代”革命中发挥作用。由于土匪的政治立场难以界定，因此，学者们感到很难将他们划分为革命者或反革命者，“好的”或“坏的”。1949年以来对土匪问题研究的受挫，我想这点是很主要的。然而，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他们不再带着“男性偏见”只关心历史竞争中的成功者，他们也开始平等地注意失败者，以及那些对“正统”社会不适应的人们。我希望中国新的学术气氛能够激励研究者们努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学术界变化着的学术目标，既注意研究运动，又关注个体；既研究成功者，也不放弃失败者。我相信每个个体，他或她的所言所行，都应该得到公正严肃地对待。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我的这本书，我希望它能勉励中国读者同样思索这个问题。

虽然土匪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常被视为“坏分子”，但这本书想说明的是，土匪活动往往是他们面临险恶环境所作出的一种合理反应，恰恰是那些“可敬的人们”逼迫这些“坏分子”为匪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把土匪放入历史长河进行考察，他们反抗独裁统治的传统源远流长，从盗跖时代直到现代，他们常被统治当局污蔑为“反社会者”、“危险分子”等等。虽然我已不再将土匪浪漫化，虽然我还指出了土匪既创造英雄业绩，又干出丑陋勾当，但是我希望中国读者会赞同这一看法：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对中国人民永恒的生命力的一种敬奉，而不是对中国社会“黑暗地区”的批评。

我愿再次表示，我深感惶恐向中国读者奉献我的这本书，而且迫切地期待着他们的评头论足。如果这本书能够对中国学者深入某些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充分涉及的领域有所帮助，那么我将感到无比欣慰；如果它能鼓励中国学者对社会底层的造反者和不适应环境者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详尽的研究，那么我会更加感到自豪。我对徐有威等先生的翻译再次表示感谢，同时对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中译本表示感谢。

贝恩飞

民国史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新课题(代序)

余 子 道

英国学者贝思飞教授的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被西方学者推许为“民国土匪活动第一部综合研究专著”。在它问世两年以后，经徐有威等同志译成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毫无疑问，贝思飞这一专著的中译本与中国同行们和广大读者见面，将会有力地促进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的发展。

研究民国时期的土匪，这在中华民国史中还是一个新兴的课题，是很值得史学界重视的。众所周知，土匪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差不多在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在解放以前的中国，也不是在民国时期才有土匪，而是古已有之。但是，民国时期的土匪以其人数之众多、影响之广大、分布之普遍、组织程度和武装水准之高，却为其他时代所未有，而且它的存在和发展又同民国相始终。这一切都成为一种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这是清末民初以来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危机的严重化程度。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对民国土匪的历史有过不少记载，但史学界对此却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写出一本较为系统、完整的专著。根据《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年版和1983年版）公布的《1912～1948年中国历史书目》，在民国时期的30多年中，从未有一本土匪史问世。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比较注重于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对土匪一类下层社会和社会病态现象的研究，

尚未引起重视，以致在这一领域中几乎形成一片空白。虽然近几年来，中国近代会党史的研究呈现出相当活跃的景象，其中对土匪历史也有所涉及，但以土匪历史作为一个正式课题，至今尚少有人涉猎。正如英国学者格雷厄姆·哈钦斯所指出的，“研究民国史的历史学家们传统上将注意力集中在众多的军阀个人经历、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行为上，与此相反，土匪现象显然受到冷遇。”*这种状况，中外史学界有相似之处。西方史学界在早期也只是注重研究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以后才注意于对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然后又把视线转移到下层社会的历史，一步一步地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贝思飞对民国时期土匪问题的研究，被西方史学界称道为“出色地矫正了这种不平衡”。虽然他对这一课题的探索，还不能说是对“本世纪前30年中国的土匪世界和土匪现象最终的详细分析”，正如作者自己也认为的那样，他只“希望这本书能为概括中国土匪问题打下一个基础”。但是应当肯定，作者做了一件极有价值的基础性工作，为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土匪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土匪这一社会群体在民国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探索这一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使人们科学地认识这种社会病态和社会弊端以及消除这一现象的正确方向。人们可以出于不同的动机和愿望，采取种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去审视土匪问题，从而引出许多不同的结论。然而，历史学家是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任务和职责的，他们可以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种方法，对土匪这一社会现象作出理论的说明和历史的描述，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土匪历史的研究，对于拓展民国史学科研究的领域是有意义的。无可否认，民国时期的土匪是民国史上客观存在的、对于社

* 引自1989年12月的《亚洲事务》。

会各方面有广大影响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实体，它具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特有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语言——黑话。诚然，土匪及其活动是属于社会下层，是社会病态的一种表现。但是，社会历史是一个整体发展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变化是由各种力量造成的。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都在历史进程中表现了各自的作用，各种力量相互形成一种合力，历史按照合力的方面发展变化。在这历史的诸种力量中，不可忽视的是社会下层的活动，历史的前进、停滞或倒退，其中都体现了它们的作用。长期以来，史学工作中忽视了对社会下层的研究，把社会下层历史的许多重要课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是不够全面的。对民国土匪的研究，是民国史中侧重于向社会下层和社会病态的层面所进行的探索，对于开拓民国史领域，从多方面揭示民国社会的本来面貌，更全面地说明民国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具有积极的作用。

土匪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民国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研究。对民国时期土匪历史的研究，会广泛地涉及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土匪历史研究当然不以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等的研究对象为研究对象，然后它广泛地涉及后者的内容，它同后者各部类历史的研究有着不少交叉的内容。例如，我们要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军事史，尤其是战争史和军队史，就需要研究土匪的历史。民国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军事长官是从匪帮首领起家的，或者曾经充当过土匪头子。军阀军队的兵员来源，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土匪队伍。形形色色的反动军队中，有不少时而为兵，时而为匪，甚至兵匪相通、兵匪一家。军阀战争、反动政府对革命军队的“围剿”战争、帝国主义侵华战争，都利用过匪帮，有的规模还很大。凡此种种，已成为民国军事活动的重要特征。因此，研究民国土匪历史，有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民国的军事史。同样，研究北洋军阀、西南军阀和国民

党新军阀,研究伪满政权、伪蒙政权和汪伪政权的历史,也都离不开对土匪的研究。更不用说,对土匪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对于深入审察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剖析其深层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揭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必然崩溃的趋势,有着更深远的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对土匪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处,去审视这个社会。

民国时期的土匪问题,曾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和政策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敌人,夺取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曾经对土匪问题作过系统的研究,并为正确处理土匪问题作过长期的坚韧不拔的努力。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到解放战争后期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创造了解决土匪问题的十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指出土匪属于“游民”阶层,“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40—641页)对民国时期土匪的研究,也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和深入地去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探讨和总结革命运动在认识和处理土匪一类游民阶层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这不仅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裨益的,而且对于世界上一切存在土匪的国家,都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贝思飞1969年至1974年曾在英国里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

的博士生导师就是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教授。《民国时期的土匪》的雏形是他的博士论文。在他毕业后赴日本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期间,继续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撰写成这本专著。正如作者自己说的:这本书是在英国和日本的图书馆中撰写的。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在西方国家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新的治史态度”,许多新的学者要求纠正传统史学仅仅注重历史上的大人物的倾向,提出历史学家主要应当关心普通民众。本书作者说道:“我对中国土匪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寻求新的民众史的时代精神中开始的。”在这个史学思潮的背景之下,英国社会史著名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于1969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土匪》的专著,提出“社会土匪”的论点,它对本书作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贝思飞所说:“尽管此书篇幅不大,却成为后来很多学者研究此专题时的指南。”《民国时期的土匪》正是在西方的这一史学新潮流之下的产物。

《民国时期的土匪》是作者的一部力作。迄今为止,我们所读到的国内外学者撰写的关于这一课题的论著,当推这部著作最为完备和最有份量。虽然关于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作者与我们之间并不尽相同,但是作者对于研究土匪问题所抱的严肃宗旨和良好的出发点,作者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博采众长的研究方法,对历史事物作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全方位审视,以及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都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一个民国史的研究工作者,我对作者为研究土匪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努力和所获得的丰硕成果,深感欣慰。通读贝思飞的这部书,我觉得这本书结构合理,首尾一贯,点面结合,取材典型,文笔流畅,不是关于民国时期土匪活动的几个零星故事的凑合,而是一部有深厚功底和鲜明个性的历史著作。

一、作者以历史学家的视野来观察民国时期的土匪问题,力求得出关于这一问题的科学的、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结论,努力寻求对土匪活动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这两者之间的统一。正如作

者所说：“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对中国人民永恒的生命力的一种敬奉，而不是对中国社会‘黑暗地区’的批评。”同某些借助土匪问题而肆无忌惮地污蔑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人截然相反，作者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同情和敬慕之心，这在本书中是随处可见的。

二、正如美国学者易劳逸教授所指出的，贝思飞这部著作作为人们开辟了“洞察20世纪中国的一扇窗户”，“民国时期举国上下的土匪现象显露出20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深度，贝思飞的这部专著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向我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窗户，从这扇窗户中，我们看到了领悟这种危机的新方法。”*这部书以大量的令人信服的材料和深入周密的分析，向人们揭示了土匪的猖獗正是民国时期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土匪这种社会现象的发生与发展 and 民国时期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这一现象的自身又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同那些有关土匪活动的侦探小说和历险记不同，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是一本严肃的社会政治历史著作，“对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史极有裨益”。

三、本书在结构上首尾一贯，既有全貌性的概述，又对重点问题和个案作了具体而深入的剖析。全书以勾勒民国时期土匪的概貌、性质和特征以及它在20世纪初期的三种表现形式作为序曲，然后系统地考察了作为土匪这一社会群体之所以发展起来的社会条件。这里包含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条件，诸如农村的破产、农业的凋敝、国家的分裂、政局的动荡、官吏的腐败、军阀之间的混战以及外国侵略势力的渗透等等。同时，对于自然条件也给了足够的重视，深入地分析了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自然灾害等等在形成土匪过程中的作用。对于人口激增和土匪兴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只是一般地提到了，可惜对这一重要问题，并未展开论述。接

* 引自《中国季刊》119期(1989年9月)。